

# 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 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

李 朝 津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摘 要

東洋史學與社會科學為日本中國研究兩個切入方法，但學界向來都側重史學，少談及社會科學中國研究的發展情況。本篇以慶應義塾大學為個案，討論 1899 年以至 1985 年該校政治學科的中國研究，指出國家一直是日本近代備受關注觀念，因此當社會科學傳入日本時，政治學成為最重要範疇。慶應之政治學者亦因此受西方政治學風影響，以西方政治理論研究中國，建立一個與東洋史學不同之傳統。此種趨勢到二戰後並無改變，但由於西方影響力由歐洲轉移美國，美國之區域研究亦成為慶應義塾大學戰後重要方法。雖然如此，本文亦強調戰後政治學科之中國研究並非全盤西化，戰爭所產生之體驗亦對中國研究帶來衝擊。政治學科方法及研究不但代表中國研究內涵的轉變，亦代表對中國新認識角度的出現，成為本世紀日本之中國研究以至中國認識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日本、中國研究、慶應義塾大學、石川忠雄、中日關係、社會科學、區域研究

\* \* \*

## 壹、前 言

中國研究在近代日本一直是個重要研究課題，不過到戰後，戰前的中國研究即飽受批判。首先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是日本的擴張歷史，戰時曾參加滿鐵調查工作的旗田巍著有「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學の傳統」一文，他指出戰前日本之亞細亞研究是在侵略體制下進行，在實證的學風下固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因為缺乏歷史體系，最後是無視其研究所產生結果，與權力緊密結合，成為國家侵略的工具。不過對中國認識的錯誤究竟是否完全是國家權力問題，增淵龍夫則持否定看法，他認為戰前的中國研究固

---

\* 本稿撰寫過程中，承蒙日本中央大學邀請，得以在東京搜集資料，又出版時獲得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於此一併致謝。

然受到近代主義的影響，採取一個蔑視中國態度，戰後亦犯同樣毛病，研究中國多以馬克思主義為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並非日本的問題，張冠李戴，造成日本的中國研究缺乏主體性。「故無論是對過去中國的蔑視，或對現代中國的禮讚，都是由同一國際感覺出發，但在同一視角下卻出現兩極化的表現」。因此增淵以日本中國研究之問題所在，不但要避免權力的扭曲，同時更要爭取回本身之主體性。然而直到 70 年代，日本的學界似乎並沒有擔心到所謂主體性問題。五井直弘在檢討上述說法時，認為只要對戰前東洋史學作出批判，則權力干擾似可以避免；至於馬克思主義是否如增淵龍夫所言，完全脫離日本問題範疇，他認為戰前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過份理論化，導因於東洋史學者都沒有參與馬克思主義者有關中國問題討論，才沒有辦法認識到真實的中國。換言之，五井對中國研究的主體性仍深具信心，以歷史方法為仲介，是可以達到真實世界。<sup>①</sup>

然而進入 1980 年代以後，因為整個學術環境的改變，對日本中國研究又有新的看法。在美國，由於解構主義影響及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思潮興起，日本研究學者開始討論日本是否真的如一般所言，對西方亦步亦趨，抑或日本在向西方學習時，亦保有自己的主體。在這方面最著名便是 1993 年 Stefan Tanaka 出版的 *日本之東洋 (Japan's Orient)* 一書，書中雖以東洋史為名，但中國研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份。Tanaka 認為東洋史之出現，與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而產生的自我認同有密切關係，東洋成為日本自我認識一個重要他者，在接受西方文明過程中，日本創造東洋史這個學問範疇，它不但是要研究中國，事實上更是重新建構日本史——包括它與中國關係。東洋史的各個議題，如否定堯、舜存在之可能性，邪馬台國的所在，都涉及日本在亞洲以致世界史上的位置，故東洋史重要學者白島庫吉創造出亞洲歷史發展的南北文化互爭雄長的模式，其實是要突出日本在這個亞細亞歷史進程中，不只佔有一融合南北的特殊位置，而且可以據此與西方文明抗衡。<sup>②</sup> Tanaka 一書可以說反駁戰前中國研究為西化下產物說法，指出日本是有自己的議題，同時在界定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位置中，亦突顯自己的主體性。不過過份強調日本主體性以致日本人認同的作用，Tanaka 亦打破了歷史的真實性，所謂東洋史，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他者，完全是日本主觀認識的結果，日本無法與其他地方真正聯繫起來。

在日本，對中國研究衝擊最大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80 年代中國大陸對文革的尖銳批判，使到日本國內的批判界猛然落空。正如溝口雄三指出，自竹內好以來日本的中國研究者都認為日本過去過份接受西方影響，因而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意義。但他認為竹內好等亦是五十步笑百步，過去中國研究固然接受西方之階段論，但竹內好等稱頌中國之農民主義，同樣是過份理想化其作用，把農民當作終極目的，亦成為另一種進步發展的階段模式。<sup>③</sup>溝口認為中國與日本是無法比較，中國與日本都是受西

註① 有關旗田巍、增淵龍夫及五井直弘的看法，可參考五井直弘，*近代日本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1976），頁 iii-viii。

註②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註③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頁 45。

方影響而作出改革，中日方式不同，因歷史不同，無所謂優劣，日本現代化太快不是劣，中國打倒專制的革命亦非優。<sup>④</sup>在回顧日本過去的中國研究，溝口的看法頗類似增淵龍夫，認為過去的日本的中國研究缺乏主體性。不過溝口並不止於此，他企圖提出一個「以中國作為方法」的概念，為日本的中國研究找出新路向。

溝口檢討日本自明治以來中國研究的，認為日本一直在追求一個世界普世價值，但所謂普世價值其實就是歐洲文明，它成為了解中國的方法，中國只不過成為當時普世價值歐洲文明的個案而已。故溝口一反過去做法，認為中國研究應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承傳，了解其脈絡所在。所謂「以中國作為方法」即是以中國的脈絡作為世界發展的一部份，這個模式雖然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也屬於世界眾多模式之一，它與歐洲模式以至日本模式並存，溝口稱這為一個多元世界，中國研究就是扮演了解這個多元世界的一部份。溝口是一位明清思想史學者，以他深湛的功力，當然可以輕而易舉指出中國歷史傳承所在，譬如個人主義，他即指出中國之個體觀念自有其「公與私」之歷史脈絡，自明清以來，中國家庭非單一繼承，故形成以家族為主之空間，而族內公產與私產亦沒有如西方及日本明確劃分，其影響所及，亦可以見之於 1978 年後中國改革開放後之鄉鎮企業模式；<sup>⑤</sup>近代康有為、孫中山以至毛澤東以下所倡導的大同思想，其實亦可以上追及明末清初的思想。<sup>⑥</sup>諸而類此，均反映溝口對中國歷史掌握甚深。

溝口對日本主體性及中國真實性的重視，可以說是 Tanaka 的對立面。雖然兩人都強調日本之主體性，但 Tanaka 認為中國歷史只不過是日本東洋史家了解日本的工具，中國歷史的真實性完全不在 Tanaka 考慮之列。換言之，Tanaka 是採用後現代方式，以為歷史只不過是書寫者的解釋敘事而已，真實與否並不重要，故 Tanaka 從來不追究東洋史家所談中國歷史的真實性。溝口不但把主體的日本及客體的中國分的很清楚，而且深信日本主體有認識真實中國歷史的可能。溝口的看法引伸出兩個問題：首先是主客體之間能否分得如此截然清楚，主體切進任何客體時，其實已經是相互影響。薩伊德雖指責西方「東方主義」殖民化東方，他其後亦承認帝國與殖民地間的關係並非單向，帝國在殖民過程中亦受到當地的影響。<sup>⑦</sup>但溝口並未能說明日本東洋史家在研究中國過程中，其主客體互動經驗曾否產生影響；其次是溝口有更大的企圖心，要利用中國為方法建立一個多元世界，亦即中國歷史、日本歷史及歐洲歷史是並存的，但既然是並存，各個歷史如何溝通整合，溝口並沒有提出一個有力的平台。

無論是 Tanaka 的虛假性歷史或溝口的真實性歷史，他們都是由歷史時間的觀念探討日本之中國研究。時間的確是近代世界以來的重要認知主要架構，Edward W. Soja 指出時間觀念突出的轉折始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代表人物是柏格森 (Henri Bergson)。柏格森把空間與空間建構成一個對立面，空間代表一個枯燥、刻板的自然地理量度實體，因此它是被動的、停滯的，而時間則視為具動力以至創造力，代表人

註④ 同前註，頁 25。

註⑤ 同前註，頁 61。

註⑥ 同前註，頁 12~15。

註⑦ Edward W. Said, "Introduction,"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類文明的結晶。<sup>⑧</sup>故無論 Tanaka 或溝口，他們對中國所採取的觀測表面上似相反，但似乎無法越過自 19 世紀以來之歷史制限，首先是時間的連續性，溝口無疑十分重視傳承的作用，Tanaka 亦無法避免此點，雖然他極力反對直線時間的進步方式，但仍是在馬克思的辯證發展模式下，開展其日本 vs 西方的二元模式；其次是一個普世性的社會結構，溝口以獨特社會作為其歷史觀基礎，故中國、日本以致歐洲各具差異性，共同組成一個多元的世界，但這個世界為何？則沒有進一步說明。Tanaka 的社會則建構在個人認同上，但他從不討論這個以虛構認同組成的社會，究竟有無真實性，故二人均無法擺脫歷史所給予的時間與空間的侷限。

時間雖然是 19 世紀以來的認知主流方式，但空間並未完全被壓殺，它的代表者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源起於 19 世紀，亦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國一個方法。有關社會科學的源起，Immanuel Wallerstein 認為最有貢獻的思想家有四，他們分別是涂爾幹、馬克思、韋伯及柏森斯，他們共同點都是關注社會構成的方式，涂爾幹以理性作為社會的組織基礎，馬克思則提出社會階級的衝突性，韋伯則指出社會權力基礎在乎能否取得合法性，比較令人訝異是柏森斯，他一向被認為是美國社會學者的保守派，但 Wallerstein 則認為柏森思是集上述三人之大成者。<sup>⑨</sup>據 Wallerstein 之分析，社會科學之特點是由理性、階級衝突及合法性觀察社會，它無疑是結構主義，由空間角度切入。當日本在 20 世紀初引進社會科學時，其中國研究自然亦受其影響，這是本文著眼地方，亦希望以此區別史學上的東洋史研究及政治學上之中國研究。當然，在整個 20 世紀歷史是一個強勢學科時，社會科學無法不被時間觀念所影響。Soja 指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雖強調社會學想像力，但歷史背景仍是 Mills 了解社會學思想重要因素。<sup>⑩</sup>

雖然如此，空間概念到最近 30 年逐漸受到注意。傅柯便警覺到空間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它不必是等同地理學。空間不必涵指具體意義，需要有涇渭分明的屬性；它基本上是一個社會建構，而且是多元化，可以互相重疊。Soja 讚揚傅柯對空間的新認知，但仍指責他的態度不夠明確，未能指出空間是另一個思考出發點，只是隱約同意結構主義是時間方式外另一個組織各社會元素的方式。<sup>⑪</sup>比較直接了當是社會學出身的 Wallerstein，他指出社會科學的特性有三點，它們是斷裂時間，劃分文明與野蠻，突出社會科學中市場、國家與民間社會三個範疇。<sup>⑫</sup>第一點是突破時間的限制，第二點及第三點是重新分配空間，雖然第二及第三點為人攻擊，以其有帝國主義式的一元思維，但刻劃一個普世標準卻是社會科學的目的，無礙作為時間以外的一個思唯方式。

社會科學自 19 世紀末便開始傳入日本，根據蠟山政道研究，明治以來政治學分為

註⑧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 123.

註⑨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pp. 224-8.

註⑩ Edward W. Soja, *op. cit.*, pp. 13-14.

註⑪ Edward W. Soja, *op. cit.*, pp. 16-18.

註⑫ Immanuel Wallerstein, *op. cit.*, pp. 221-222.

國家學派及實證學派：國家學派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代表，它於 1882 開始教授德國憲法，強調法律為國家之基礎，政治應統攝在國家之內，到二戰結束以前，公立學校的政治學大都無法擺脫法律學的影響。至於實證學派則流行私立學校中，它以英美法學為主軸，認為國家只不過是政治一部份，政治學仍應為主要研究對象。但由於東大在學術的領導地位，法律一直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sup>⑬</sup>蠟山政道上述看法固然有一定代表性，但日本之政治學科是否完全受制於法律範疇？同時公、私立學校之界限是否如此截然不同？能否以公立德國、私立英美系作為分野？以慶應義塾大學為例，自福澤諭吉創校以後，固然以輸入英美學問為鵠的，但如大塚桂指出，到明治末年，東京帝大的政治理論漸走向多元及社會集團學說，而慶應大政治學科的學風卻反而由英美系統轉移到德國系統，大塚桂的研究反映出公私立學校的界限並非如此分明。<sup>⑭</sup>再就法律與政治兩學科而言，慶應大學政治學科在日本各大學法學部相當突出，有相當獨立自主性。例如在戰後，它是日本各大學法學部中首先實行獨立招生，同時其規模領先日本各大學政治學科。<sup>⑮</sup>因此本文以慶應大學政治學科為例，從而探討日本社會科學中國研究的發展情況。

就中國研究而言，日本之中國研究向來以東洋史為重點，政治學科之中國研究向受忽視。但近 20 年來，東洋史中國研究之影響力日趨下降，政治學反成為日本認識中國的新視野，不了解日本政治學科及其中國研究過去的發展，實難以掌握日本未來對中國的認識。選擇慶應作為個案，因為向來執長日本政治學科中國研究牛耳的東京大學法學部，近年一反趨勢，其中國研究人才有無以為繼之歎，中國研究的重心落在東大教養學部及慶應政治學科兩機構中，而兩機構中國研究之崛起，均與輸入美國區域研究的社會科學新方法有密切關係，而其中又以慶應在區域研究中著力更深，故以慶應為個案，探討美國區域研究對日本學術影響所在。

## 貳、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設置及發展

慶應義塾創立於 1858 年，初期教授以荷蘭為主體之西洋學問，明治維新後則以英語及英美學問為課程重心。1890 年慶應設立大學部，其下分設文學科、理財科及法律科三科，開私立學校設現代大學制度先河。<sup>⑯</sup>不過所謂大學只是慶應自行升格，並未得日本政府承認，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是 1886 年東京大學改制為帝國大學，它是日本政府唯一承認的大學，其他學校均不在此列，故慶應雖自行升格為大學，當然不受到承認；另一個原因是明治時期的政治情況限制，當時私立學校是在野黨大本營，成為反對聲浪溫床，當道者自然不輕易給與私立學校合法資格。<sup>⑰</sup>然慶應於此時宣佈升格為大

註⑬ 田口富久治，*戰後日本政治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頁 12。

註⑭ 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學者像*（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 2，170。

註⑮ 池井優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百年小史*（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8），頁 7-8。

註⑯ 慶應義塾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編，*慶應義塾百年史*，中卷（前）（東京：慶應義塾，1958-1969），頁 189。

註⑰ T. J. Pempel 著，橋本錢市譯，*日本の高等教育政策 (Patterns of Japanese Policymaking: Experiences*

學，實源當時各私立學校筭筭自危意識，特別是明治政府於 1889 年頒佈憲法，聲稱日本政府實施法律，以後均參考國內法律，而各私立法律專門學校原來以教授歐美國法為主，新的法制環境不但抬高東京帝國大學的地位，亦使各私立學校地位邊緣化，不得不紛紛自行升格，以求穩固本身地位，而慶應是私校率先實行改革者。<sup>⑧</sup>雖然如此，政治學科仍未算正式出現，不但法律仍為主要學習課程，而且當時所謂學習，仍以翻譯英美著作為主，沒有一個完整教學設計。

政治學科是到 20 世紀初才正式出現，而且內容亦走向專業化。其轉折點是 1899 年（明治 32 年）文部省再頒佈「私立學校令」，准許私立學校設置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學校或中學校，但其規定其行政、財政與及教員聘任均需由政府監督，<sup>⑨</sup>大學學位雖然仍未得到文部省之正式承認，但私立大專學校總算得到合法地位。慶應在 1898 年（明治 31 年）便為此正式化作準備，實行一貫學制，即小學 6 年（當時稱為幼稚舍）、5 年中學（稱為普通學科）、5 年大學科（包括 2 年預科及 3 年大學科）。大學科分為文學部、理財學部、法律學部、政治學部 4 學部。政治學部才算正式成立，但初期老師不是由外校兼任，便是由別一學科借調過來，如擔任政治學的田中萃一郎（1873-1923）是慶應文學科 1892 年畢業生、擔任外交史的林毅陸（1872-1946）是文學科 1895 年畢業生。<sup>⑩</sup>真正政治學科出身是板倉卓造（1879-1963），他在 1903 年由政治學科畢業，其後在慶應普通科擔任英語教師，1907 慶應送其到英國、美國及法國學習國際法，1910 年歸國，成為政治科首位政治專業的專任老師，擔任「政治學」、「國際法」、「法語」等科目，著有**國民政治時代**、**國際紛爭史考**等書籍，被目為慶應政治學科之創始者。<sup>⑪</sup>

中國研究在政治學科成立相當早，其主要擔任者是及川恒忠（1890-1959）。及川 1913 年畢業於政治科，畢業後擔任科內助手一職，其後被派往法國及中國留學，1920 年回日本，開設中國研究科目，成為政治科第二位專任教授。<sup>⑫</sup>此時適值日本高等教育再變，明治末年之「私立學校令」雖准許私立學設立大學或專門學校，但其資格仍未得到正式承認，同時公立大學亦只有帝國大學，學額實在不足，故在 1918 年再度頒發所謂「大正大學令」，准許各地辦理公私立大學，除規定在學年數、成立法人基礎，大學組織亦以學部為主，有一定數目學部才能成立大學，同時亦得設立研究科，作為進修之用。<sup>⑬</sup>故當中國研究在慶應大學成立時，政治學科不但是最早成立之專業科目之一，它亦是於社會科學最早走向專業化學科之一。

專業化之實行方式，首先是重組科系，慶應原分文學部、理財學部、法律學部及政治學部 4 部，現在法律及政治合併成法學部，文學部及經濟學部依舊，再成立醫學

from Higher Education) (町田：玉川大學出版部，2004)，頁 45-6。

註⑧ 中央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編，**中央大學百年史**，通史編上卷（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頁 207。

註⑨ 參見中野文庫，<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rm32-359.htm>。

註⑩ 慶應義塾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編，**慶應義塾百年史**，別卷法學部，頁 114-120。

註⑪ 同前註，頁 121-23。

註⑫ 池井優編，前引書，頁 174-5。

註⑬ 參見中野文庫，<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rt07-388.htm>。

部，成爲新制綜合大學。另一方面是提高研究水平，准許各大學設博士學位。日本頒發博士學位始於明治 20 年，但只限於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候選人在大學院課程修了後，由大學總長推薦，再由文部大臣授予。現在各大學教授會均得審查推薦博士候選人，再由文部大臣授予。<sup>④</sup>除了推動研究深造學位外，法學部亦出版學報**法學研究**，作爲學術研究之發表園地，**法學研究**爲法律及政治兩學科共同發表園地，而且在日本法學部中，法律專業多佔強勢地位，但在當時板倉卓造之強勢推動下，戰前**法學研究**之政治研究論與法律可以說是平分秋色，而且在**法學研究**創刊號 6 篇論文中，即包括及川恒忠之「支那國務總理論」等 4 篇政治學論文，日後亦規定政治學概論爲共同必修科，爲日後應慶之政治學科打下重要基礎。<sup>⑤</sup>

### 參、政治學科刊物**法學研究**之研究狀況

中國研究之進入慶應政治認知領域，可以說由 1920 年正式開始，它的發展過程，由時間上可以分爲戰前及戰後兩個時期，在研究內容上，則可以由**法學研究**及其教授著作可以發現。

首先觀察戰前**法學研究**之內容，**法學研究**發刊於 1922 年，到 1941 年因爲戰爭休刊，到 1947 年才再度復刊。下面爲有關該刊論文之一些分析統計資料：

	法律	政治	政治總類	外交	日本	中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美國	俄國
1922-1941	103	110	60 (54.5%)		15 (13.6%)	12 (10.9%)	10 (9%)	5 (4.5%)	3 (2.7%)	3 (2.7%)	2 (1.8%)
1946-1965	209	259	86 (33.2%)	16 (6.2%)	68 (26.3%)	31 (12%)	10 (3.9%)	10 (3.9%)	5 (1.9%)	26 (10%)	7 (2.7%)
1966-1985	303	210 (內有其他22)	83 (39.5%)	17 (8.1%)	44 (21%)	21 (10%)	2 (1%)	2 (1%)	2 (1%)	13 (6.2%)	4 (2%)

上表之文章數目主要爲**法學研究**中之論說類，有關資料、研究筆記或法律判例均不收載，因爲在西方學術體系下，論說類最能反映出知識系統之中核。其中論說文章又分爲法律及政治兩類，由數字看，**法學研究**所刊文章，頭兩個時期法律及政治論文幾乎相等，只有在 1966-1985 年時期，法律論文稍多，佔有率約爲 60%。由此可見，法學部從走向專業開始，法律及政治兩範疇便平分秋色，無分軒輊，在日本各大學中算是異例。由於法律不在討論項目內，故上表不列出細目，政治則分爲政治總類、外交、日本、中國、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及俄國 9 項。

政治總類主要是指政治理論及思想，它是所有類別中數量最多，反映社會科學中之政治理論及方法最受注意，而所謂理論，又大多數由西方輸入，在戰前政治理論多半集中在政治結構，特別是國家結構與運作，如頭 3 卷所包括的論文有：「民主政治

註④ 同註②，頁 61~2。

註⑤ 池井優編，前引書，頁 6。

論」、「社會學者之政治研究」、「Laski 氏之國家論」、「政治學之性質及範圍」、「公共團體即國家之概念」、「各國憲法中上院之地位」、「政治思想史上憲法發佈前」、「比例代表法」、「議會制度之不信用及其改革」，其他類別大致上沒有變化。但到戰後則有顯著變化，首先是政治總類比例的減少，反映出對西方理論倚賴的減少；其次是有關日本研究在戰後則大幅度增加，原因大概是戰後急於回顧過去，探討走上戰爭道路的因素；第三是外交類研究的增加，外交主要指國際組織或問題，在戰前，所謂外交多指兩國在權力上的縱橫捭闔，少談國際架構，但二戰後有關國際組織問題論文大幅增長；第四是地或研究，無論是戰前或戰後，中國一直是據於首位，至於僅次中國的其他國家則因時期而變，在戰前第二位是英國，到戰後則改變為美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到 1966 年後雖仍佔第二位，但數量已有減緩，主要原因是其他地區或國家的研究興起（共 22 篇），其中最重要是東南亞（6 篇）及歐洲（6 篇），故英國、法國、德國三國研究，到戰後雖大幅度減少，不過若加上歐盟，則仍有 12 篇，跌幅沒有想像的深。

中國研究的比例雖然在戰前及戰後沒有太大改變，但其研究方式則有實質差異，下面會比較兩段時期的中國研究。

## 肆、慶應大學戰前之中國研究

在戰前慶應政治學科之中國研究主要以及川恒忠和英修道（1902-1994）兩位教授為主。及川恒忠出身於岩手縣，1913 年慶應政治科畢業。畢業後直接被任用為助手，1917 到 1918 年曾到上海及北京深造，1919 年留學法國一年，回國後任教於政治學科。及川最初以辛亥後中國政治經濟專攻為主，在法學部開「支那法制論」及在經濟學部開「支那經濟事情」，其後繼承林毅陸，開「東洋外交史」。及川退休後，其中國政治講座由石川忠雄繼承，東洋外交史則由英修道繼承。<sup>⑥</sup>英修道出身於東京都，1926 年慶應政治學科畢業，入大學院，由及川恒忠擔及其指導教授，1928 年擔任助手，1934 年升任助教授，擔任東洋外交史專業。<sup>⑦</sup>不過一直至戰爭結束為止，慶應的中國研究仍然以及川為主，他的研究重心大部份在中國政治組織，早期以民國時期的國會與行政系統互動為主，後期則在政黨及憲法，下面簡略介紹及川的研究。<sup>⑧</sup>

「支那國務總理論」為及川第一篇談論中國政治論文，內容主要談論總理、總統及國會三者關係。及川否定民元舊約法，認為是革命派制訂，過份理想，不切實際。

註⑥ 英修道，「及川教授の學風を偲ぶ」，*法學研究*（東京），33 卷 2 期（1960 年 6 月），頁 601~3。

註⑦ 池井優編，前引書，頁 179~80。

註⑧ 及川在*法學研究*中發表 8 篇文章如下：「支那國務總理論」，1 卷 1 期（1922 年 3 月）；「支那大總統論」，1 卷 2 期（1922 年 6 月）；「再就支那大總統論」，1 卷 4 期（1922 年 12 月）；「對支那府院問題一考察」，2 卷 2 期（1923 年 6 月）；「支那憲法史抄」，9 卷 3 期（1930 年）；「國民政府財政方針」，9 卷 4 期（1930 年 12 月）；「支那政黨史抄」，12 卷 1-2 期（1933 年 3~6 月）；「評英修道著『滿洲國與門戶開放問題』」，14 卷 2 期（1935 年 6 月）；「支那今日之法律」，14 卷 3-4 期（1935 年 9~12 月）。



例如約法三十四條規定總統所有命令必須國務員副署，但未明白說明國務員是否包括總理。1916年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總理一職，但根據約法則必須段祺瑞副署，當段氏拒絕時，即使憲政陷入僵局；另外舊約法規定國務員須得國會同意才得組閣，但中國創建共和後，國會多半由反對黨掌控，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在結論中，及川認為中國目前要實行責任內閣制，必須有英法的政治成熟程度才可行。言下之意，責任內閣制非中國目前所宜，及川在文中隱約贊成強而有力之總統制，他這一看法在下一篇文章會更進一步深入探討。

「支那大總統論」一文主要是談及總統在共和制度中應扮演的角色。及川指出舊約法中總統無權無責，因為根據約法規定，在國內，行政職權由總理掌理；對國外，宣戰媾和之發佈均要經國會同意。然見之於實際運作，從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巴黎和會講和，無論宣戰或和約，國會均沒有真正參與，約法只是一紙空文，故整個政治運作缺乏一有力領導人或機構。另一方面，及川讚揚袁世凱制訂的新約法，因為它給與總統實際權力，如無須參議院同意，總統可直接任命各級官員；總統具有增修約法權力；在軍事上，袁世凱時期亦設有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總統能直接指揮軍隊，但袁氏死後，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被廢除，總統控制軍隊權力漸弱。上述均為及川批評舊約法中有關總統權力規定之不當，顯而易見，他支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此中又以總統為權力核心，對他而言，中國目前內部混亂，法制未上軌道，必須有一有力強人，才足以駕馭。

「支那政黨史抄」是1933年作品，及川由西方兩黨政治觀點切入，認為近代中國很早即有兩黨政治。所謂兩黨是指孫中山的革命派及康有為的維新派，兩者均起源於1884年中法戰爭，孫中山曾回憶「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而康有為亦說「馬江敗後，吾以諸生伏闕上萬言書，請及時大變法，乃可自立」，及川以此為據而論證兩黨政治的起源。以後革命黨由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以至中國國民黨，而維新派則由強國會、保國會、保皇會、立憲公會、共和黨、進步黨以至研究會，均可見兩黨政治痕跡。所謂兩黨，是指激進與溫和的對立，但及川沒有明確指出激進與溫和差別之處，在辛亥革命以前，所謂激進與溫和自然是指共和君主之爭，但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及川雖意有所指是國民革命代表激進路線，但未能明確指出雙方政治目標的差異。不過所謂兩黨政治到1924年便結束，原因是孫中山採取蘇聯之階級鬥爭方式，實行一黨專政政策。孫氏死後，國民政府繼承其遺志，建立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實行訓政。

由今天的角度看，及川的論述完全是書生之見，他硬生生的把西方政治理論套用到中國，亦反映出當時政治學者的中國研究仍未臻成熟。不過由及川的研究，亦可以得到下面兩點的觀察：首先是及川的研究完全以國家法律體制為出發點，不合乎蠟山政道之「公立法學，私立實證」的分類法。大塚桂認為是慶應由英國政治學風轉向德國政治學，源起於1903年文部省官員木場貞長擔任政治學講座開始，木場是伯倫知理信徒，因此帶來德國的國家政治學。<sup>20</sup>然木場只是兼任講師，他有沒有如此大的影響

註<sup>20</sup> 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學者像*（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170。

力，值得懷疑。事實上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雖然以民權為號召，但到 1880 年代，亦逐步轉向國家主義，由「民權轉向國權」是 19 世紀末日本知識份子普遍現象，慶應政治研究趨向的變化，有跡可尋，不一定完全歸因於木場。

其次是及川文章有強烈的實證氣息，亦即指韋伯式之客觀及文本研究方法。所謂客觀，也就是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及川之門生故舊回憶稱及川非常關心中國及中日關係，1927 年在望月軍四郎基金會資助下，曾親往上海居住兩年，搜集有關資料；1937 年驟聞中日戰爭爆發，及川亦為之喪神。<sup>⑩</sup>但在及川文中，完全嗅不出此種氣息，這是與東洋史中國研究最大差別地方。內藤湖南之東洋史固然強調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縱然白鳥庫吉強調實證研究，他亦企圖刻劃出日本與亞細亞地區的關連性，而及川之研究對中日關係則是淡然處之。不但對國外，對國內情況亦同樣，1920 年代正是「大正民主」時期，憲法的實踐方式，元首、內閣及國會間權力的分配等等，均是當時日本現實政治中爭議性甚大的題目，然及川亦不著一語。至於所謂文本研究方法，即以官方發佈文獻為主要根據，再輔以其他研究成果。文本之客觀性建立在兩個前題，即文本藉著文字語言可以確切傳達研究對象的真實情況，研究者只需對文本進行分析，不必實際參予或田野考察。另一個前題則是政治架構是決定政治體制的主要因素，只要建立一個完善法律體制，政治可達至理想。在這種前題下，現實即非研究者所應關注。

## 伍、慶應大學戰後之中國研究

慶應大學戰後之中國研究以石川忠雄為中心，他是及川恒忠的繼承者，事實上他不但繼承及川衣鉢，而且進一步發揚光大，使中國研究成為慶應法學部以至戰後日本政治學界中的重點單位，在此首先概略介紹石川忠雄生平。

石川 1922 年出生於東京市神田，1942 年考進慶應大學經濟學部，但入學約一年便因為戰爭動員進入空軍，1945 年 8 月復員後再到慶應復學，1946 年 9 月以戰爭關係提早畢業。石川自言在進入經濟學部時對中國農業便十分有興趣，但慶應之經濟學部並無中國研究專業，當時及川恒忠正尋找助手，故在其導師介紹下，成為政治學科中國政治課程助手。日本大學之助手是未來教授，故及川對之促頗嚴，不但隨堂聽講，同時亦修改其發表論文，石川很快便在 1948 年便升為助教授。石川晉升迅速另一個原因是戰後美軍佔領下日本大學教育制度大幅度改革，首先是廢除各種專門學校，一律簡化為美式四年制大學，其次為強化通識教育，大學一、二年級成為所謂教養課程，三、四年級為專業課程，同時大學研究所設立碩士及博士課程。在這種大量擴充高等教育的環境下，給予石川晉身機會。1948 年慶應改制為新制大學，石川亦同時升為助教授，雖然石川抱怨所謂助教授只是名義，薪水實際仍維持助手等級，但助教授一職仍給予石川發展機會。<sup>⑪</sup>

註 ⑩ 池井優編，前引書，頁 175。

註 ⑪ 石川忠雄，*禍福こもごもの人生*，第一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4），頁 8-91。

中國研究在石川的領導下能在政治學科成爲主流研究，石川的個人能力當然有不可磨滅功勞。事實上慶應改制爲新式大學時，政治學科內由助手升任助教授的學者亦不少，其中包括內山正熊、中村菊男等優秀研究人員，石川突圍而出，提升中國研究地位，自然有其個人能力因素。但由大環境看，慶應政治學科可以發展其中國研究，則與美國戰後東亞政策有密切關係。

首先有關石川研究課題的選定。石川是以中國共產黨問題專家稱著，他最重要貢獻之一是探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1953年石川發表其第一篇有關中國共產黨之研究論文「李立三路線問題一考察」，重新評價李立三路線。傳統中共黨史認爲李立三在1930年代推動之「城市暴動」政策背離共產國際路線，是所謂「左傾冒險主義」，但石川爲李立三辯護，其「城市暴動」政策並沒有違背共產國際路線，至少共產國際當時並未明確表示不同意李立三政策。<sup>②</sup>在以後數年的研究中，石川論證焦點集中在共產國際政策落實到中國過程。50年代中，由於反共氣氛高漲，中共一直被視爲共產國際傀儡，其政策均由蘇聯掌控，但石川則認爲中共非鐵板一塊，內部有不同路線及派系，縱然是親蘇派也不一定聽命共產國際。在其1955年所發表「武漢政府時代之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石川指出中共內部對革命策略共有分折共有四個不同看法，它包括共產國際主張左派趁機動員所有力量，全面革命；陳獨秀則重視國共合作形式，傾向有限動員；毛澤東主張大規模動員農村，連小地主也要打倒；瞿秋白亦主張大規模動員，但以工人爲主體。石川之看法，重點是指出中共之主體性，非蘇聯共產主義集團之附庸。

石川此別開一面看法是否來自美國？1951年美國學者史華滋（Benjamin Schwartz）在1951年便發表其重要著作**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之崛起**，裡面便主張毛澤東之共產主義是由中國革命經驗發展出來，與共產國際不同。而史華滋作品是由石川翻譯，於1964年在日本出版。究竟石川有沒有受到史華滋的影響？據石川回憶，當史華滋作品出版後，及川便馬上出示該書給石川，雙方並就此作出討論，石川無疑很早便了解史華滋的觀點。<sup>③</sup>不過石川之選擇中共作爲其研究課題是出於及川建議。據石川回憶，當其擔任助手時，及川交與之研究課題是中國憲法，其成果便是1952年出版之**中國憲法史**。<sup>④</sup>但其後之所以轉向中國共產黨，亦是及川建議，並非史華滋的影響；<sup>⑤</sup>同時由民族主義觀點切入中共研究，亦不一定採自史華滋，應該源於日本在戰敗後對中國研究之重新反省。日本在侵華戰爭中陷入泥沼狀態，最後導至失敗，戰後中國學者認爲主要是忽視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例如有關尾崎秀實研究中便指出，1935年以後中國出現新民族主義，它有來自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號召，亦有來自民衆的抗日情緒，到1936年西安事變，這種新民族主義最後匯聚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身上，

註② 石川忠雄，「李立三コス問題の一考察」，**中國共產黨史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59），頁145-97。

註③ 石川忠雄，「譯者あとがき」，**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主義と毛澤東の抬頭**（東京：慶應通信，1964），頁282。

註④ 石川忠雄，**中國憲法史**（東京：慶應通信，1952）。

註⑤ 石川忠雄，**禍福こもごもの人生**，頁78-9。

然日本完全漠視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動向，是其對華政策最大失著。<sup>⑳</sup>由尾崎秀實研究可了解到日本學界透過戰爭體驗，對中國民族主義有更深認識，石川忠雄肯定中國民族主義之想法，實無須來自於史華滋。

雖然如此，美國中國研究的方法，對石川仍有重要影響，這見之於方法及學科規範上。在方法上，是實證主義再次受到肯定，石川在戰後回顧日本戰爭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日本戰前處於一個閉鎖狀態。所謂閉鎖，非指物質層次上，而是思想層次上。日本之所以步入戰爭，因為政府一直宣傳此次戰爭為生死一戰，在不斷重覆宣傳底下，日本人包括石川本人均深信不移，最後完全以聖戰視之。故維持思考的客觀及開放，是石川由戰爭中得到的反省，但如何能夠維持一個客觀視野，石川在 1956 年訪美時得到實證。

石川在 1955 年升任教授，1956 年在哈佛燕京社的訪問學人計劃邀請下訪問美國。石川在回顧訪問美國的經驗有兩點，首先他指出美國的中國研究原來甚弱，二戰後中國研究勃興，主要是中共的崛起，現實上不能不瞭解敵人，故才大量資助中國研究。雖然如此，美國中國研究的特色仍是「學究式」，由基礎出發，非急功近利，因此其中國研究固然以中共為對象，更重要是了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與列強互動的情況及中國近代歷史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背景。石川認為日本的中國研究類似記者式的究明現狀，完全缺乏美國的基礎工作，應加以改善。<sup>㉑</sup>

其次石川指出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可能超越日本，石川承認日本在中國研究上已累積一定傳統，但在方法上則嫌陳舊，尤其研究近代中國上，不少日本中國研究仍使用過去的歷史及語言方法，而最近美國之中國研究導入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人材，利用其最新成果分析近代中國，石川認為日本之中國研究一直保守原來方式，故必須由新角度考慮，才能迎頭趕上。<sup>㉒</sup>

石川強調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但慶應自 1898 年成立政治學部，1918 年政治學科走向專業化後，社會科學其實已成為政治學科一重要視野，故石川主張導入社會科學，與以前之社會科學有何不同？石川所謂社會科學是美國戰後所強調之跨學科研究，而最能反映跨學科的切入點則是區域研究，這是石川自美回國後所大力倡導。由美國回日本的第二年 1958 年，石川擔任法學部學習指導副主任，大事改革法學部課程，據石川回憶，政治學科課程改革最大特點在區域研究的設置，包括亞細亞、歐洲、美洲、非洲各地區研究講座的設置，以社會科學方法整合各地區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sup>㉓</sup>在石川領導下，政治學科各範疇固然大事改革，如邀請有經濟學背景之田中宏、有社會學背景之川合隆男、霜野壽亮加入教師行列；另中國研究更有進一步發展，神谷不二與松本三郎研究焦點雖為朝鮮及東南亞，但都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另從石川研究中國之學生亦加入區域研究，除山田辰雄繼承其講座外，其他如小田英夫、

註 ⑳ 今井清一，「尾崎秀實の政治・外交論における民眾と民族の問題」，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尾崎秀實の中國研究**（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83），頁 25~55。

註 ㉑ 石川忠雄，「アメリカの中國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研究**，頁 324~5。

註 ㉒ 同前註，頁 345~6。

註 ㉓ 石川忠雄，**禍福こもごもの人生**，頁 94~5。

富田廣士亦在石川勸導下，發展非洲以至中東之區域研究，成為日後慶應中國研究冒升主要原因。

區域研究之發展，除了美國因素外，亦有日本的內在背景。區域研究是冷戰時代發展出來一種研究方式，自薩伊德提倡後殖民研究以來，便不斷受到批評，但多半把它視為冷戰產物，亦即區域研究之作用是認識敵人，劃分敵我界線。然 Harry D. Harootunian 指出二戰後之區域研究，有更深的認識論意義。所謂區域研究是 Talcott Parsons 社會學影響下的產物，Parsons 要處理問題是現代化，其基本論據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模式，但現代化亦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如何調和永恆及變動兩個矛盾現象是 Parsons 要解決的難題。Parsons 由社會體系提出解決方法，首先他強調社會是個有機體，可以透過自我調整，不斷脫胎換骨，其次認為傳統社會是可以走向現代，要害是它必須選擇正確發展模式。在這個論証下，Parsons 的現代化理論承認一個有機民族社會的存在，區域研究便是在這前提下發展出來。然民族社會是有好與壞的差別，所謂好民族是指能接受現代價值者，壞的便代表無法成功現代化。因此區域研究的作用便是要認識各個民族的特質，文本研究被視為遠離現實方法，只有透過田野考察才能第一手了解當地情況，對本土的重視成為區域研究第二個特點。<sup>④</sup>

民族主義是貫穿石川忠雄中國研究的重要因素，而美國區域研究所主張，無論是多元民族或本土方法，恰好是石川所期待，這是石川導入區域研究主要原因，不完全是美國知識的掌控，石川到 1990 年代仍然堅持上述看法。1998 年石川在一個公開演講中討論中國近代發展，他仍堅持民族主義是最重要的動因。他並舉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三個要點，首先是中國民族主義會超越任何意識形態之上，中蘇分裂即最好證明；其次是為追求中國之富強平等，中國不會自外於國際社會，因而採用穩健之民族主義；第三即認為中國會在追求富強下，逐步擺脫社會主義。<sup>⑤</sup>

## 陸、結 論

日本政治學科之中國研究傳統，是基本上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隨著大學科際專業的出現，中國研究亦逐漸成形，可以說是從無到有，沒有 Tanaka 所談及由漢學到東洋學的典範轉變過程。然政治學在社會科學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因為國家在日本近代化中一直是個重要觀念，探討國家的功能作用，是日本政治學者重要任務，沒有所謂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分別，而政治學科的中國研究亦不能不由此一角度切入。

然國家觀念在日本不同時段有不同解釋，由慶應之中國研究看，戰前與戰後的差異點有二：首先是組織國家的基本要素，戰前由結構功能觀察國家的形成，而戰後則

註④ H. D. Harootunian, "Postcoloniality's Unconscious/Area Studies' Desire," in Masao Miyoshi &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8-161.

註⑤ 石川忠雄，「中國における民族主義と共產主義」，*禍福こもごもの人生*，頁 216-9。

由民族主義切入。這結論頗違反近代日本歷史的常識，因為日本發動戰爭，民族主義正是其重要基本動因。然正如傅柯所言，論述是個不規則的體系，單一地由民族主義了解日本歷史會容易忽略社會各個層面的真正實踐。另一方面戰後對民族主義有不同解讀，反映出戰前之民族主義有另一個面相，此兩現象顯示戰前之民族主義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其次是研究國家方法，戰前之中國研究文本為主，戰後則受美國區域研究影響，強調本土的實際了解。這結論亦可能導出第二個疑問，即日本在戰前不乏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不但有文本知識，不少亦具有實地中國經驗，故戰前政治研究不能說只有文本。不過正如石川忠雄指出，中國研究應是「學究式」及基礎式，非如記者式，亦求處理現實政策層次。因此追求一個實證的中國研究是文本方式的目的，而學術性中國研究與日本政策有無互動，它如何影響及戰後的學術研究，也許以後需進一步探討。

總括來說，本文只是了解日本政治學科中國研究的第一步，各政治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內容、他們與當代社會的互動、慶應義塾大學以外其他學術機構、以至 1985 年以後之中國研究情況，尚有開拓空間，有待以後發展。

\* \* \*

(收件：96 年 2 月 12 日，接受：96 年 3 月 11 日，修正：96 年 3 月 11 日)

# Japan's Chin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Keio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Chiu-chun Lee*

## Abstract

Oriental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are two approaches that are commonly employed in Japan's China studies field. However, a review of the China studies in Japan shows that social science has largely been ignored over oriental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Using Keio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was brought in as part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became extraordinarily influential because the idea of the state was always a major concer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Japan.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wholesale importation of this Western approach,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of Keio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 tradition in China studies fiel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riental history. This strong imprint from the West surviv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lthough the origins of the influencing source switched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Area studies, a new approach emerging in the postwar American academy, became the major framework in analyzing China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Keio University. Nevertheless,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ress that Keio's political scientists did not accept the American approach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Their experiences from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ar also created impact upon China studies field. This new approach brought in by the political science renders not only a change in methodology and themes in China studies field in Japan, but also a new perspective in knowing China which wi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is century Japan's China studies field and Japan's knowledge of China.

Keywords: Japan; China studies; Keio University; Ishigawa Tada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ocial science; area studies

### 參考文獻

- Pempel, T. J. 著，橋本錢市譯，*日本の高等教育政策 (Patterns of Japanese Policymaking: Experiences from Higher Education)* (町田：玉川大學出版部，2004)。
- 中央大學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編，*中央大學百年史* (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
- 中野文庫，<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rei>。
- 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學者像* (東京：勁草書房，2001)。
-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東洋史學* (東京：青木書店，1976)。
- 今井清一，「尾崎秀實の政治・外交論における民衆と民族の問題」，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尾崎秀實の中國研究* (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83)，頁 25~55。
- 及川恒忠，「支那國務總理論」，*法學研究* (東京)，1 卷 1 期 (1922 年 3 月)，頁 82~120。
- 及川恒忠，「支那大總統論」，*法學研究* (東京)，1 卷 2 期 (1922 年 6 月)，頁 98~138。
- 及川恒忠，「再び支那大總統に就て」，*法學研究* (東京)，1 卷 4 期 (1922 年 12 月)，頁 1~27。
- 及川恒忠，「支那政黨史抄」，*法學研究* (東京)，12 卷 1-2 期 (1933 年 3~6 月)，頁 1~43，21~86。
- 田口富久治，*戰後日本政治思想史*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年)。
- 石川忠雄，*中國憲法史* (東京：慶應通信，1952 年)。
- 石川忠雄，「李立三コス問題の一考察」，*中國共產黨史研究* (東京：慶應通信，1959 年)，頁 145~97。
- 石川忠雄，「アメリカの中國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研究* (東京：慶應通信，1959 年)，頁 324~5。
- 石川忠雄，「譯者あとがき」，*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主義と毛澤東の抬頭* (東京：慶應通信，1964 年)。
- 石川忠雄，*禍福こもごもの人生*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4 年)。
- 池井優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百年小史*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8 年)。
- 英修道，「及川教授の學風を偲ぶ」，*法學研究* (東京)，33 卷 2 期 (1960 年 6 月)，頁 601~3。
- 慶應義塾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編，*慶應義塾百年史* (東京：慶應義塾，1958-1969)。
-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 年)。
- Harootunian, H. D. "Postcoloniality's Unconscious/Area Studies' Desire." In Masao Miyoshi &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Soja, Edward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 .